

# 十八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理论的新成就

## ——论章学诚关于史书体裁的辩证思想

罗炳良

Taking Zhang Xuecheng as an example, the author examines new achievements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article finds that eighteenth-century historiography tended to summarize previous historical writings. This included Zhang Xuecheng's work on historical theory, and the School of Textual Criticism's critical apprais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documents. These two aspects of historical research constituted the two major trends and achieveme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ighteenth-century historiography. In the author's opinion, although Zhang Xuecheng did not gain recognition in his own lifetime, his work influenced Liu Zhiji and Zheng Qiao and inspired the later practice of historical theory research.

中国古代史家对史书体裁的认识,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其文化积淀成为历史编纂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世纪史家章学诚关于史书体裁的认识中,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思想,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迄今为止,尚未见专门论述这一问题的文章。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就此问题作一分析,以期有助于全面了解章学诚的史学成就,评价他对十八世纪史学理论的贡献。

### 一、关于史书体裁起源的考察

中国史书体裁的源头在哪里,是历代史家共同关注和积极探究的问题。汉代学者刘歆、班固认为:“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sup>①</sup>把古代典籍区分为记言体与记事体,影响深远。后代史家又有《左传》为编年体之祖,《史记》为纪传体之祖的说法。唐代史家刘知几认为:“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sup>②</sup>十八世纪的史家们继承了前贤的传统,认识到要正确理解史书体裁的起源,必须首先弄清中国历史上所独有的经史关系问题。钱大昕、章学诚等人都对“六经皆史”说作了系统的阐述,认识更加明确。章学诚认为:“古无经、史之别,六艺皆掌之史官,不特《尚书》与《春秋》也。今六艺以圣训而尊,初非以其体用不入史也。而经部之所以浩繁,则因训诂、解义、音训而多。若六艺本书,即是诸史根源。”<sup>③</sup>后人之所以有先经后史的概念,主要是汉代以后儒家思想定于一尊的结果。章学诚说:“史之部次后于经,而史之原起实先于经。《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苍颉尝为黄帝之史,则经名未立,而先有史矣。后世著录,惟以《史》《汉》为首,则《尚书》、《春秋》尊为经训故也。”<sup>④</sup>基于这种认识,章学诚认为应当从六

经的发展变化中考察史书体裁的起源。其主要论点是：

### (一)“《尚书》无定法，而《春秋》有成例”。

章学诚不同意把《尚书》视为记言体史书，认为《尚书》产生的时代非常遥远，虽然当时文字已经发明，王朝设置了史官，但也只能记录下一些先民生活的简略事迹，编录成原始档案材料保存。所以，《尚书》不可能产生出史书体裁。他指出，后代史家用后世定型的史书体裁去规范上古书籍，导致了记言、记事分体的误区。“后儒不察，而以《尚书》分属记言，《春秋》分属记事，则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事目，则左氏所记之言，不啻千万矣。《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sup>⑤</sup>古人没有空言著述，六经皆先王政典，根本不存在记言体史书。然而后人误执《尚书》为固定体裁，纷纷效仿，晋孔衍作《汉尚书》、《魏尚书》，隋王通作《续尚书》。这些人削足适履，把原来事言有机结合的史书拆散，专录其言成书。对此，章学诚驳斥说：《尚书》“因事命篇，本无成法，不得如后史之方圆求备，拘于一定之名义者也。夫子叙而述之，取其疏通知远，足以垂教矣。世儒不达，以谓史家之初祖实在《尚书》，因取后代一成之史法，纷纷拟《书》者，皆妄也”。<sup>⑥</sup>章学诚指出前人的错误，不但是一种远见卓识，而且对进一步探索史书体裁的起源至关重要。

章学诚长期从事校讎学研究，对“古今学术源流，诸家体裁义例，多所发明”。<sup>⑦</sup>他推阐先秦儒家孟轲的思想，发明新义：“《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盖言王化之不行也，推原《春秋》之用也。不知《周官》之法废而《书》亡，《书》亡而后《春秋》作。则言王章之不立也，可识《春秋》之体也。”<sup>⑧</sup>章学诚对《孟子》的释义是正确的，孟轲主要是从史学的社会功能方面讨论《诗》与《春秋》的嬗变，强调“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sup>⑨</sup>的经世作用，章学诚则从这一时代嬗变中揭示出史书体裁的起源。

夏、商、周三代史官执掌记录王命与军国大事，记言记事都有固定格式。<sup>⑩</sup>由于记注制度健全，记录方式固定，只须把这些不同形式的文章汇录成编即可实用，不须按什么体例勒裁。《尚书》中的典、谟、训、诰、贡、范、官、刑各篇，就是这些原始记注文字的汇编。西周末期以后，诸侯坐大，王室式微；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乱，礼崩乐坏，史官失其职守，王室记注制度被破坏，各种固定文体的记注资料不复存在，导致了《尚书》汇编成文之法的衰亡。各诸侯国的史官由于没有格式固定的记注材料可资利用，便不能不形成一定的修史义例，即所谓的“春秋书法”。章学诚说：“《诗》与《春秋》之有升降，三代后世之所以分也。盖太师陈诗观风之职废，而贤者多抱隐忧，乃以《诗》为忠愤之所寄托，不得不微其辞矣。太史执简奉诤之职废，而圣人乃有惧志，遂以《春秋》为予夺之所寓，不得不严其辨矣。”<sup>⑪</sup>各国修史都按照一定书法格式，按纪年顺序记载历史事件，讲究属辞比事，辨别义例，“《尚书》无定法，而《春秋》有成例，”<sup>⑫</sup>从而产生出年经事纬的编年体史书体裁。《春秋》严义例之辨和编年纪事形式的形成，在章学诚看来是中国史学的起源。“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而已，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sup>⑬</sup>可以看出，《春秋》已经具备了史学思想和史书体裁两方面特征，这就是章学诚所说的“王者迹息而《诗》亡，见《春秋》之用；周官法废而《书》亡，见《春秋》之体”。<sup>⑭</sup>

### (二)“编年、纪传，同出《春秋》。”

十八世纪史家在论述史书体裁起源时，又有编年体取法《春秋》，纪传体取法《尚书》的观点。章学诚则认为三代史官记注制度破坏而《书》体衰亡，其流变与《春秋》合而为一。“《书》与

《春秋》，本一家之学也。《竹书》虽不可尽信，编年盖古有之矣。《书》篇乃史文之别具，古人简质，未尝合撰纪、传耳。左氏以传翼经，则合为一矣。其中辞命，即训诂之遗也；所征典实，即贡范之类也。故《周书》迄平王，而《春秋》托始于平王，明乎其相继也。”<sup>⑩</sup>他举例说，《春秋》记载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历史，《左传》释经，分别记载了周襄王派宰孔和王子虎赐齐、晋的命辞。按照传统看法，这些都是训诂记言之体，应当归入《尚书》。然而孔子修《书》时并没有把它们收入，与《尚书》中内容相同的《王侯之命》篇并列。《左传》以编年体记载王命，可以证明《尚书》文体已经包容在编年体史书中，“《尚书》之支裔折入《春秋》，而《书》无嗣音”。<sup>⑪</sup>那么，所谓编年体取法《春秋》、纪传体取法《尚书》的说法，和认为《春秋》为记事体、《尚书》为记言体的说法一样，都是后人强分学术流别而造成的误解。章学诚考察了史学源流，提出了“编年、纪传，同出《春秋》”<sup>⑫</sup>的看法。编年体出于《春秋》，当然没有问题，因为这种体裁本来就是《春秋》所创立的。章学诚认为纪传体同样继承《春秋》而来：“纪传正史，《春秋》之流别也。”<sup>⑬</sup>纪传体史书取法《春秋》经、传义例，纪按时间编纂史事，应用《春秋》的属辞比事之法，实际上是编年体。传记载事件、人物始末，对纪起补充作用，实际上是效法《左传》以传释经。表、志又对纪、传起辅助作用。所以章学诚说：“左氏合而马、班因之，遂为史家一定之科律。”<sup>⑭</sup>

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认为纪传体出于《尚书》固然不正确，认为出于《春秋》同样失之偏颇。章学诚立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够用辩证的观点看问题。他不仅批驳了诸如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和纪传法《尚书》、编年法《春秋》等孤立绝对考察史书体裁起源的做法，而且用辩证联系的观点，把纪传体四种体例的内在联系揭示出来，进而揭示出编年体传以翼经到纪传体传以释纪的外部联系，得出了史书体裁起源的辩证认识：“《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纬经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以搜逸也。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sup>⑮</sup>

## 二、关于史书体裁演变的认识

唐宋以前，由《春秋》《左传》开创的编年史和《史记》《汉书》开创的纪传史影响最大，尤其是班固撰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和荀悦撰编年体断代史《汉纪》，更成为后代史家尊奉的圭臬。南宋袁枢撰《通鉴纪事本末》，又开创了纪事本末体。章学诚对十八世纪以前这三种主要史书体裁的发展演变过程进行了考察，揭示出其辩证发展规律。他认为：

### （一）“纪传之初，盖分编年之事实，而区之以类者也。”

《春秋》《左传》开创的编年体，具有严格的书法，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把一些不相连贯的历史事件纳入时间序列之中，便于记载复杂的史事，较之《尚书》记事不连贯、文体混杂、缺乏时间概念是一个明显的进步。所以章学诚说：“《尚书》变而为《春秋》，则因事命篇，不为常例者，得从属辞比事，为稍密矣。”<sup>⑯</sup>编年体提高了史学的科学性，无疑具有自身的优点。但是，编年体按年月排比史事，又具有局限性。它只记载那些能确定时间的事件，而那些无法纳入时间系统中的重要事实却得不到记载，不能触类旁通。司马迁在编年体基础上创立纪传体，弥补了编年体的缺陷。纪传体中纪、表、志、传各种体例看似各有分工，实则相互联系，分开来看，每一篇都单独成篇；合起来看，各部分相互补充，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特别是各传按类标题，可以容纳更多的事实，便于记载较为复杂的历史内容。纪传体的优点是“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

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sup>②</sup>由编年体发展到纪传体,是历史编纂学的进步。章学诚认为:“《左》《国》变而为纪传,则年经事纬不能旁通者,得以类别区分,为稍密矣。”<sup>③</sup>《史记》因系初创,难免疏失,具有类例不纯的缺陷。《汉书》断代为史,体例更趋成熟,所以“迁《史》不可为定法,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sup>④</sup>纪传体吸收了编年体的优点,又克服了编年体之不足,遂超越编年而成为正史。“纪传之初,盖分编年之事实,而区之以类者也。类则事有适从,而寻求便宜,故相沿不废,而纪传一体,遂超编年而为史氏之大宗焉。”<sup>⑤</sup>

## (二)“今之编年,则又合纪传之类从,而齐之以年者也。”

汉代以后,在纪传体方兴未艾之时,编年体仍然继续发展,体例不断完善。荀悦《汉纪》和袁宏《后汉纪》采用连类列举的方法,在一事之下记载与之相互关联的人物和各项制度,克服了早期编年体因记事单一而遗漏重要史实的不足,扩大了记事范围。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皇朝政权嬗替频繁,统治者急需总结经验,巩固统治政权。编年体比较适合记载治乱兴衰的历史,符合时代需要。这一时期编年体皇朝史与纪传体皇朝史并驾齐驱,出现了空前繁荣。以晋史撰述为例,共有23种,其中纪传体《晋书》12种,编年体《晋纪》11种。这些著作虽然留传后世者不多,但在当时却积累了丰富的编纂经验,为唐宋编年体的兴盛创造了条件。

编年体史籍在自身不断完善的同时,也吸收了纪传体的长处,克服了纪传体的缺陷。纪传体成为史书体裁的主流以后,历代史家相沿不废,又渐渐产生了弊病。“迁《书》所创纪传之法,本自圆神,后世袭用纪传成法,不知变通,而史才、史识、史学转为史例拘牵,愈袭愈舛,以致圆不可神,方不可智。”<sup>⑥</sup>另外,纪传体本身也存在问题:“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sup>⑦</sup>对此,后代史家具有明确的革弊意识。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总结和继承了《汉纪》、《后汉纪》的成就,并把历代纪传体史书中分散在纪、传各部分的同一史事集中起来叙述,同一人物的事迹或一个历史事件始末完整地系在该人该事纪年起讫时间下面,不仅扩大了编年记事容量,而且体例更为成熟。由于《资治通鉴》“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sup>⑧</sup>,成为历代编年体史书的集大成之作。司马光创立的新编年体史法,为后代史家继承,沿至清代不绝,难怪章学诚总结这一体裁的辩证发展时说:“今之编年,则又合纪传之类从,而齐之以年者也。”<sup>⑨</sup>

## (三)“神奇可化臭腐,臭腐可化神奇。”

史家怎样认识史书的发展及其优劣,关系到本人史识的高低。章学诚评价史书,“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有同类纂”,<sup>⑩</sup>并非仅仅局限于体裁本身,而是看各种体裁如何更好地反映史学内涵。由《春秋》发展到《汉书》,再到《资治通鉴》,一方面表现为两大史书体裁相互取长补短,共同完善;另一方面表现为史书体裁久则生弊,不断衰败。章学诚对此有深刻地认识,他说:“神奇可化臭腐,臭腐可化神奇。知此义者,可以不执一成之说矣。”<sup>⑪</sup>所谓“神奇”与“臭腐”,用章学诚自己的话注解就是“有所得者即神奇,无所得者即臭腐。”<sup>⑫</sup>他用这种方法评价史书体裁,包含着辩证认识。

中国古代编纂的《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册府元龟》等类书,仅仅是分类辑入时人书籍,对史学思想、史书体裁的发展一般来说没有促进作用。况且时代早的类书又不如后代类书内容详赡,体例完备,可以说更没价值,属于臭腐之列。然而类书保存了大量后世失传的书籍,后人可以借此征求佚书,反而显得极为宝贵。所以章学诚说:“古之糟粕,可以为今之精华,非贵糟粕而直以为精华也。因糟粕之存,而可以想见精华之所出也。”<sup>⑬</sup>

北宋欧阳修撰《新唐书》，继承《史记·三代世表》和《汉书·古今人表》的体例，作《宰相世系表》表彰世族。然而欧《表》只列宰相，有些宰相出身轻微，无门阀可表；有些世家大族又没有宰相，势必造成遗漏；体例不够完善。特别是邓州韩氏，既无宰相，又不是世族，只因欧阳修心仪韩愈，便把他载入《世表》，实为自乱其例。欧《表》体例杂乱，选择不精，当然够不上神奇之作。但是，后人考证唐人事迹，或者借助《世表》考证金石刻画，就不嫌载人驳杂冗滥，反而唯恐收人物不多。北宋陈彭年等人依据《切韵》修成《广韵》，只有《姓氏》门中名物象数注释精详，其余门类则非常简略。大约是修书时只有姓氏方面的书可资利用，其他材料缺乏，修书者又不广泛搜求，故详略悬殊。这种注书体例当然很不可取，以致其书缺少神奇之处。但因注中所引之书后代亡佚，后世考证前代姓氏的人，反而从这部分大获收益。以上二书当时堪称臭腐，后世却发挥了神奇之效，所以章学诚说：“古人著书，有于义例未善，而流传后世转得其用者”。<sup>④</sup>

《史记》、《汉书》以后，纪传体包举记言记事，纪传叙事中夹杂诏令奏疏，阅读不便，“方述一事，得其纪纲，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披阅之者有所懵然。”<sup>⑤</sup>刘知几主张把纪传中的诏令、奏疏抽出，单独列为一体，称为《制册章表书》，按类区分。宋代叶隆礼撰《契丹国志》、金代宇文懋昭撰《大金国志》，前者把石敬瑭降契丹表，后者把金人封张邦昌和刘豫的册文以及南北往来誓书各自别录成篇，不入正文之中。章学诚认为，虽然二书史料价值不高，作者只不过把这些内容随手编录，未必有自觉的史学意识。但在他看来，却恰好实践了刘知几的主张，收到了作者始料未及的神奇效果：“诸家杂纂，不拘于纪传成规，而因事立例，时有得于法外之意，可以补马、班义例之不及者。”<sup>⑥</sup>

袁枢作《通鉴纪事本末》，章学诚认为只不过是把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的史事区分事目，加以完整编排，根本算不上史学，只能称为史钞史纂之书，在史学理论方面没有创获。但是，袁枢在史书体裁方面却有可贵的创新，开创了纪事本末体裁。这种体裁具有二个优点，一是能够弥补纪传、编年两种体裁固有的缺陷，原原本本地完整叙述重大历史事件的始末原委；二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记载事目，体例运用灵活。章学诚评价说：“司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sup>⑦</sup>正因为纪事本末体具有上述优点，所以一经产生便受到史家们青睐。明清二代史家不仅采用纪事本末体记载当代史事，而且补作了前代史书，蔚为壮观。

### 三、关于史书体裁创新的设想

章学诚在不断探究史书体裁的基础上，萌发出创新史书体裁的设想。其主要想法如下：

#### （一）“纪传之史，分而不合，当用互注之法以联其散。”

纪传体史书虽然是中国古代史书的主体，然而这种体裁本身存在着弱点。纪、表、志、传分书，势必会把一事之内容分散在四体中，不相连贯。史家欲求史事前后照应，只能采用自注形式，相互标著。刘知几认为这种做法不足取，批评说：“同为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此其所以为短也。”<sup>⑧</sup>章学诚认为，刘知几对纪传体裁的批评是必要的，只是没有抓住要害。如果能够因其例推而广之，采取“纪传之史，分而不合，当用互注之法以联其散”<sup>⑨</sup>的措施，就能够避免纪传互殊、前后矛盾。第一，把纪传正文中的“事详某传”、“互见某篇”等用词改为旁行子注。历代纪传体史书中，只有

表、志中使用子注的方法,而纪、传正文中因属辞一体,从无用子注者。史家修史,习惯于把上述用词与正文叙事联书,分割了史书内容,破坏了首尾完整,文字既不连贯,体例又很杂乱。如果改为旁行子注,不但便于检核史事,而且史书文字顺畅,体例精当。第二,撰著《别录》。史书记载一事,可能会分散在纪、表、志、传各篇中,仅在每篇标明子注,只是便于检核事实,却无法使人抓住要领,认清事情的全貌及其性质。所以,还必须做一篇《别录》,标明一朝几件大事,以此为纲,把分散在纪、表、志、传中与此相关的内容,以其篇目按类系于某事之下。史家修史时,把《别录》置于书首,提纲挈领,是补救纪传体史书的有效办法。

### (二)“编年之史,浑灏无门,当用区别之法,以清其类”

在中国古代史书中,编年体史书的地位仅次于纪传体史书。由于“著述自有体要”<sup>⑩</sup>,二者所承担的纪事功能不同,在反映历史的内容方面各有千秋。编年体存在的不足是“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而莫绎其终,揽其终而莫志其初,如山之峨,如海之茫,盖编年系日,其体然也”。<sup>⑪</sup>章学诚鉴于上述情况,提出了“编年之史,浑灏无门,当用区别之法以清其类”<sup>⑫</sup>的主张。其方法仍然是通过编辑《别录》,以济其穷。当然,由于编年体和纪传体义例不同,自然不能用治纪传体的《别录》方法治编年体,即不能强求编年体不具备的类例尽同于纪传体。编年体《别录》的具体做法,是把史书内容按下列情况区别:一是分别标出每帝纪中后妃、皇子、公主、宗室、勋戚、将相、节镇、卿尹、台谏、侍从、郡县守令之名,于名下标注他们的始见和终结年月。二是分别标出帝纪中的有关大制作、大典礼、大刑狱、大经营等内容,因事定名,区分品目,标注它们的始终年月。三是有关两国聘盟、交战等内容,约举年月,系事隶名。四是在一帝纪中不能包容首尾的人和事,在开始出现的时候,标注其终结于某帝;而在其结束的时候,标注始见于某帝。至于那些在一个皇朝无法包容首尾的事和人,也仿照这种做法,详注其终始于哪朝哪代,然后把《别录》置于每帝纪之首,可收按类区分的效果。

### (三)“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

章学诚对中国史书中的纪传体裁用功最勤,深究积弊,认识到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才能奏效。于是他下决心探索新体裁,提出了完整的方案:“纪传流弊至于极尽,而天诱仆衷,为从此百千年后史学开蚕丛乎!今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发凡起例,别具《圆通》之篇。”<sup>⑬</sup>可惜章学诚临终之前没有来得及结撰此篇,详情无法得知。但其主要宗旨在《书教》篇中有所阐述,我们可以借此观其概貌。

章学诚继承了前代史家思想,强调纪传体的优长,仍主张采用纪、传两部分内容作为新体裁的构架。但却在具体内容上别出心裁,充分显示了注重史意的独断之学。刘知几认为纪传有尊卑之分,纪中只记载帝王之事,传中只列人臣事迹,绝不能相混,否则就是体例不纯。章学诚则说后代纪传二体泾渭分明,只是体例的不同,根本不关乎尊卑褒贬之义。如果说纪尊帝王,那么帝王生身之父往往被尊为太上皇,列祖列宗被溢为先王,也应该为他们作纪了。因此,他主张:“本纪只当式法《春秋》,上备天道,下系人事而止。即帝王一己之事,不关大书特笔例者,皆不当以入纪”,“帝王之事,于本纪外,必当别为列传,冠于后妃、宗室诸传之首”。<sup>⑭</sup>

刘知几主张传应当只记人物,被史家视为成法。章学诚则反对“以录人物者,区为之传;叙事迹者,区为之记”。<sup>⑮</sup>他根据纪以包举大纲,传以详载细事的原则,主张把分散在纪、表、志、传中的典章制度、人物生平、事件始末、言论文章,或按同类编排,或备始末首尾,统统作为传,与纪中的大事相互经纬,不但能够避免歧出互现的矛盾,而且可以不受时间上的限制。既然上述内容均可包括在传里,旧纪传体中的书、志等名目就可以删去。这样较之旧史文省事明,例简

义精。除纪、传以外,章学诚主张另立表、图二种体例。他认为“人名事类,合于本末之中,难于稽检,则别编为表以经纬之。天象地形,舆服仪器,非可本末赅之,且亦难以文字著者,别绘为图以表明之。”<sup>⑧</sup>这二种体例的作用是弥补纪、传的遗漏内容,形象简明地展现历史全貌,使史书记事载人更加丰满详赡。所以说“图象为无言之史,谱牒为无文之书,相辅而行,虽欲缺一而不可者也。”<sup>⑨</sup>

《史记》和《汉书》已经创立了《年表》和《人表》体例,成为纪传体史书的有机组成部分。《年表》在魏晋隋唐时期虽一度中废,但宋至明清修史相沿不替。顾炎武说:“作史无表,则立传不得不多,传愈多,文愈繁,而事迹或反遗漏而不举,此表之所以为要也。”<sup>⑩</sup>《人表》则在《汉书》以后历代正史多付阙如。章学诚总结了历代史书立表的利弊,认为《年表》固然重要,但《宋史》、《元史》等书有表,列传仍然猥杂荒滥,可知《年表》不能根除纪传体的痼疾。他极其重视《人表》的作用,认为“不立人表,则列传不得不多,年表犹其次焉者耳。”<sup>⑪</sup>为人立表,不但可以减少立传,而且可以突出史事:“人表入于史篇,则人分类例,而列传不必曲折求备。列传繁文既省,则事之端委易究”。<sup>⑫</sup>只有做到传省事明,史书质量才能提高。

图在中国史学中起源很早,但后史失其统绪。宋代史家郑樵强调图的重要,章学诚历聘志局,纂修方志,对图的认识比前人更为深刻。他认识到图在史学中的作用:具有直观效果,文省形著;不会因时间久远传抄失实,造成鲁鱼亥豕的谬误;依检其图,洞识名物,学无空言。

章学诚在史学实践中得出了辩证认识,启发了创造意识,发展了史书体裁。新体裁中记传、图、表相互发挥,表不详而系之以文,文不显而实之以图,体例更加完善,反映出十八世纪历史编纂理论水平。但他并未停留在理论阶段,深知“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sup>⑬</sup>他所修撰的《湖北通志》,充分体现了史学体裁创新思想,特立《宋陈规德安御寇传》、《开禧守襄阳传》、《嘉定蕲难传》等篇,与湖北人物传并列。而且又在各传末尾作人名别录,按类标注。这是中国史学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应该继续发扬光大。他还准备用创设《别录》的方法研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用新纪传体方法改编元人所修《宋史》,这些虽然没有来得及完成,但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其功仍不可没。

#### 四、关于史书义例发展的思想

史书的体裁和义例,既相互区别,又密不可分。研究史书体裁,必然要涉及史书义例。在章学诚关于史书体裁的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义例思想,不研究这方面内容,就无法全面认识其史学编纂理论。限于篇幅,只能择要分述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通史之类例。史家撰写史书,是采用通史还是断代体例,这是由史家的旨趣和视野决定的。自《史记》与《汉书》产生以后,历代史学批评家围绕通史和断代史两种作史义例衡长较短,仁智互见。刘知几曾经区分史学流别,把唐代以前的史书分为《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他把南朝梁武帝《通史》、北魏元晖《科录》和唐代史家李延寿《南史》、《北史》归入《史记家》,作为通史看待。章学诚继承中国史学上的通史家风,对通史义例的认识更加明确,区分也更加细致合理。他认为刘知几“六家分史,未为笃论”<sup>⑭</sup>,导致家法淆杂不清。

章学诚认为,通史之中,义例不能一概而论。《史记》作为通史,当然没有疑问。然而李延寿《南史》、《北史》,宋代薛居正《旧五代史》、欧阳修《新五代史》、苏辙《古史》、罗泌《路史》等,集

数代史事为书,应该称为集史。集史和通史的区别在于:“通史各溯古初,必须判别家学,自为义例,方不嫌于并列,否则诚不免于复沓之嫌矣。集史原有界画,李延寿行之于前,薛、欧行之于后,各为起讫,无所重复,虽一家凡例,两书可通用也。”<sup>⑤</sup>至于《科录》,章学诚认为只是类比之书,没有著作深意,只能视为史纂,而不是通史。通史贵别识心裁,著述成家,与节钞类比之史纂,外表相差毫厘,实质相距千里。郑樵《通志》,承通史家风,阐明会通之义,是名副其实的通史,历代目录学家归入别史、故事类,大谬不然。章学诚在区分通史义例时,批评断代为史而标通史是名通实不通。他列举宋代魏了翁《国朝通典》、元代潘迪《宪台通纪》,都只记载一代史事,认为这些人是循名而不思其义。他又列举清人所修《通志》,只按府州县摘比分标山川人物,好像是府州县志的衰合,缺乏贯通。

二是史注之分例。史书流传后世,时代愈久,后人对其典章名物愈难解喻,没有注释,则茫然不知涯涘。史家注史,可分为训释文字和补注史事二途,而后者逐渐发展为一种固定义例。刘知几总结了史注义例,划分为三类:一是“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二是“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缺”;三是“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赅博,而才缺伦叙,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为子注”。<sup>⑥</sup>章学诚认为,刘知几所划分的第一、第三两类,可合而为一,称为自注。第二类是注家为别人的史书作注,可称为别注。

章学诚分析了史注义例的源流,肯定了自注的优越性。《春秋》义蕴,原为经师口耳相传,后人作《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开史注之先河。《史记》、《汉书》乃父子相传的专门家学,前者有徐广、裴骃为注,后者有应劭、服虔作解。魏晋以后,家学失传,作者蜂起,笔削缺乏严谨,宗旨比较浅显,故不需注解,前无师承,后无从学。唐宋以后设馆集众修史,只知比次日月,摘编案牘,冗滥抵牾,史书只剩下一个体例空壳。物极必返,别注之例失传,史家修史只能借助于自注。司马光修《资治通鉴》,范冲修《神宗实录》,都自撰《考异》,成为后世遵循的义例。

章学诚认为史学应当广泛采用自注体例。自注可以保存修史裁剪的史料,不致散佚不存,使后人可以见到先世藏书概况,用以校正史籍艺文著录的优劣得失。自注标明取舍材料,可以看到作者所掌握的材料是否丰富、运用材料是否得当、存在不存在剽窃他人著述的缺乏史德行为。所以他极为推崇自注义例:“翰墨省于前,而功效多于旧,孰有加于自注也哉!”<sup>⑦</sup>

三是列传之增例。章学诚继承家学,对纪传体史书各种体例殚精竭思,颇多创新。他主张删去书志、更当立图以及在帝王本纪之外另立帝王传等义例思想,已在上节叙述,不再重复。他建议增立史官传,其义例值得重视。纪传体史书的义例,自《史记》创始以后不断丰富与完善。章学诚生活在十八世纪,认识比前人更加深邃。他指出,范曄撰《后汉书》,隐括刘珍、袁宏、华峤、谢承、司马彪诸人史书;唐修《晋书》,整齐王隐、虞预、何法盛、干宝、陆机等十八家故事。然而《后汉书》、《晋书》并没有条别诸家义例,论次群书得失。尤其是后来聚众修史,更应标明某纪某志编之何人,某表某传撰自谁氏,以便后人考其臧否,评其功过是非。其实这并不困难,因为后人为前朝史家作传时,必然能够看到他们的撰著材料,明晰史事原委,足资考证,若把这些内容集为一传,或单独一人立传,或诸家集体立传,则能让时人明其宗要,后人知其故迹。若不及时编录,就会散亡殆尽。由此看来,前史虽有史官传,荒略太甚。章学诚提出仿照经学师传的学案义例做史官传,以史为经,著述流别为纬,“依类为编,申明家学,以书为主,不复以一人首尾名篇”。<sup>⑧</sup>章学诚设计的义例,打破了人物传记的写法,全面记载学术思想及其发展,可看作史学史萌芽。这种思想极其宝贵,应该予以高度重视。



## 五、余论

十八世纪的中国史学,无论史学理论,还是历史考据学,都呈现出从理论上总结传统史学的特征。章学诚在这种学术氛围中,考察了从《尚书》到《通鉴纪事本末》这一长时段内史学发展进程,对传统史学中的编年、纪传和纪事本末三种主要史书体裁做了深入研究,得出了史书体裁辩证发展的认识,成为十八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理论的新成就。

章学诚关于史书体裁与义例辩证发展理论的形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章学诚在学术上不存在门户之见,坚持史意和史法并重的治史原则。十八世纪史学呈现出两大趋势,一极是以章学诚为代表史学理论发展趋势,另一极是以赵翼、钱大昕、王鸣盛为代表的历史考据发展趋势。前者治史注重史意,偏重史学的理论问题研究;后者治史注重史法,偏重史书体裁义例、史书优劣比较。历史考据学者大多是汉学家,门户之间壁垒森严。章学诚认为学者不应该存门户之见,他虽然自知征实考据功力不如汉学家,但并不因此而排斥考据,而是尊重别人的成果,并能择善而从。所以,章学诚治史既探究史意,也探究史法。其次,章学诚治史具有会通思想。会通与断代,是史家考察史学的两种视角,而在对史书体裁认识上表现更加鲜明。强调断代为史的学者,只把眼光放在某个朝代,一部史书,论定其优劣,限制了前后联系,看不出发展变化。章学诚主张发扬通史家风,重因仍会通之道,强调史家撰著通史的重要性。他从会通的角度考察史学发展的长河,对史学的继承与嬗变观察得比较清楚,从而形成了关于史书体裁的辩证思想。再次,章学诚具备丰富的校讎学经验和编修方志实践经验。继承刘歆、班固、郑樵等人的事业,撰著《校讎通义》,清楚古今学术源流,比其他人具有优势,能够形成辩证认识。他又屡被征召纂修地方志,与志局同人论辩义例,逐渐明确了体裁义例思想。

章学诚的历史编纂学理论和中国古代另一位史学理论家刘知几的史法论相比,具有两点极其明显的特征。第一,刘知几论史书体裁义例,基本上是以静态的方法,横向比较各种体裁之间的异同,往往就两种史书比较优劣。章学诚则是在史书体裁的发展变化当中,用动态的方法,以横向和纵向两方面加以比较,不但看到了不同体裁义例之间各有优劣,而且认识到同一体裁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优劣。更为重要的是,他能够把史书的不同体裁交叉起来分析,从而看到了各种体裁之间继承与创新的现象。第二,刘知几论史书体裁义例,过多地拘泥于史法,强调纯正划一,并有用后代形成的标准去批评前人的苛刻之嫌。章学诚则不片面强调史法,而是从史法、史意两方面入手,由史法论史意,而不以史意徇史法。这样他就能灵活地看问题。例如《尚书》,尽管他不认为是史学著作,但并不因其史法不完备而不予重视。他从《尚书》所具有的因事命篇、不为体裁所拘的特点中,认识到这种义例在历史编纂学上具有重大价值。

---

①《汉书·艺文志》。

②②③《史通·二体》。

③④《校讎通义》(《章氏遗书》本)外篇《论修史籍考要略》。

⑤⑥⑧⑭《文史通义》(《章氏遗书》本,下同)内篇一《书教上》。

⑦《章氏遗书》卷十四《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

⑨《孟子·滕文公下》。

⑩⑮《章氏遗书》外编卷十八《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

- ⑪《文史通义》外篇二《为谢司马撰楚辞章句序》。
- 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
- ⑬《文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上》。
- ⑮⑯⑰《章氏遗书》卷十四《方志立三书议》。
- ⑰⑱⑲《文史通义》外篇一《史学别录例议》。
- ㉓㉔㉕《文史通义》外篇三《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
- ㉗《史通·六家》。
- ㉙《文史通义》内篇四《释通》。
- ㉚《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三》。
- ㉛㉜㉝《文史通义》内篇四《说林》。
- ㉞㉟㊱㊲《章氏遗书》外编卷三《丙辰札记》。
- ㊳《史通·载言》。
- ㊴《章氏遗书》外编卷二《乙卯札记》。
- ㊵杨万里《通鉴纪事本末序》。
- ㊶㊷《文史通义》外篇三《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
- ㊸马端临《文献通考序》。
- ㊹《文史通义》内篇五《传记》。
- ㊺《章氏遗书》外编卷十六《和州志與地图序例》。
- ㊻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作史不立表志》。
- ㊼《章氏遗书》卷十五《亳州志人物表例议》。
- ㊽《文史通义》外篇二《史姓韵编序》。
- ㊾《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
- ㊿《史通·补注》。
- ㊿《文史通义》内篇五《史注》。

(作者罗炳良: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博士生,邮编:100875)